

美国西岸作家的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

钟 玲

自 1960 年代越战期间起,太平洋周边地区(The Pacific Rim)之为一区域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¹。在 1970 年代与 1980 年代,此词等于“几乎是专属美国的用词”²。克里斯托弗·康纳里(Christopher L. Connery)批评这个词是用于“属资本主义的一般现象”(“Capitalistic universalism”)³。然而,在最近几十年,由于在太平洋的东岸地区兴起了几个强大的经济势力,这个词已有了更广义的内涵,学者也开始研究此词文化范围方面的课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鲍勃·威尔森(Bob Wilson)与威马·狄山那亚克(Wimal Dissanayake)更提出全球疆界需要重新厘定的看法,他们说:“比起以前用的国界和旧有的分区方式,现在一些地区和多国联盟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各有各发展的几个特别经济区域也出现了,一些跨文化的混合体也出现了。”而太平洋周边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⁴。蒂莫西·格雷(Timothy Gray)也相信,这个太平洋周边地区的观念是言之有理的,因为“共同拥有一个大洋的人们,会有共通的价值观、共有的市场,以及对环境方面与政治方面共同关切的事物”⁵。

本论文中,“太平洋周边地区”是指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北岸,包括以下国家或地区:美国的加州、奥立岗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俄国的西伯利亚东部、加拿大的不列

¹ “太平洋周边地区”(“The Pacific Rim”)一词源自“亚洲的周边地区”(“Rim of Asia”)一词,“亚洲的周边地区”出现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有关对西太平洋的 1967 年外交研究文件之中。克里斯托弗·康纳里提出对此周边地区四种不同的主要论述:“东方主义”(“The Orientalism”)、“现代化理论”、“左翼自由派的人文的国际主义”与“冷战论述”。(Christopher L. Connery, “Pacific Rim Discourse: The U.S. Global Imaginary in the Late Cold War Years”, *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3.)

² Christopher L. Connery, “Pacific Rim Discourse”, p. 32.

³ 康纳里认为“太平洋周边地区”是一个政治词语,并批评说:“这种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想象可以视之为企图把一个场域概念化,我们要注意,这种概念化主要是为了美国的消费者,并期望把此场域之概念合法化,透过虚假的承诺,说前景大好,实则是采用了有关太平洋周边地区的一般修词语,如动力充沛的、新兴的、再活化的、与奇迹式的。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就用‘周边话语’(‘Rimspeak’)嘲讽说:‘动力与奇迹等修词语,实意指我所能见到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现象;于是我就发现了太平洋周边地区’”。(Christopher L. Connery, “The Oceanic Feeling and the Regional Imagery”,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85.)

⁴ Wimal Dissanayake and Bob Wilson, “Introduction: Tracking the Global/Local”,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⁵ Timothy Gray, “Gary Snyder: Poet-Geographer of the Pacific Rim”,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26:1-2, 1999, p. 19.

颠哥伦比亚省、日本、韩国、中国东岸、台湾、香港和菲律宾。本论文将探讨此区域文化方面的内涵，主要探讨一些美国西岸作家的作品中，如何呈现了一种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我们可以用以下简明的方式来界定“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即某些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认同，或有意识地积极提倡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想法，并视此地区为一个文化交融的区域，或视之为一个生态地区。本文主要探讨几位美国欧裔或英裔作家的生平与作品⁶，因为在他们发展自己的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期间，他们每个人多少都疏离了欧洲文明传统，他们也都深信他们自己能跟亚洲人民及亚洲文化相应与交融。

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 1905-1982）在美国中西部出生，在纽约市自学成长，于1927年迁至旧金山定居。他在1935年写了一首诗，《另一种清晨运动》

（“Another Early Morning Exercise”）⁷，此诗描写诗的叙述者于大清早在旧金山街上散步时心中所想。出人意料的是，他当时全心想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正进行的战争，他也念及自己翻译过及描述过的唐朝诗人杜甫。他如此赞美杜甫的反战立场与人道主义情怀：

我怀疑杜甫家人为他立的木雕像
是否乃屹立于成都的祠堂中；
我怀疑是否仍有人在他那表现
理解及悲悯的脸之前烧纸钱。
他的生活艰苦，他憎恶战争，独裁，饥荒。

I wonder if the wooden image erected by his family
still stands in the shrine at Chéng Tu;
I wonder if anyone still burns paper
Before that face of hungry intelligence and sympathy.

⁶ 美国西岸华裔与日裔作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因为他们的太平洋周边意识涉及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文化与种族认同上涉及一些不同的议题。

⁷ Kenneth Rexroth, *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6, p. 92-93.

He had a hard life, he hated war and despotism and famine

因为王红公的思想非常前卫，自青年时期就信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所以他自然会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所以诗中的叙述者会关切中国大陆的国共战争。然而，他对杜甫的推崇却是因为他尊敬这位诗人之广阔胸襟与无私精神。如果把王红公这首诗放在西方扩充主义的大背景之中，就更形特殊了。克里斯托弗·康纳里指出，美国扩充主义者不断地进行“一种对外的，西向的活动”，在他们的眼中，太平洋就是他们“最后的海洋”（“the last ocean”），而且东亚正是他们下一个猎物⁸。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 1837-1912），外交家及“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发行人，把太平洋认作是“美国的湖”（“the American Lake”），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将军把太平洋划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湖”（“Anglo-Saxon lake”）⁹。王红公完全没有像他们那般持占有心态，也没有矮化太平洋地区与其东岸的诸文明，相反地，他表现出对亚洲真心的关切与景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红公的《另一种清晨运动》是一首充满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诗，因为这位旧金山诗人的内心完全投入位处太平洋另一边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事，也投入一位中国古典诗人的际遇和作品中。在美国西岸的作家怎么会产生这种意识呢？是哪些地理的与历史的因素导致这种意识的形成呢？

就美国地理位置而言，西岸与阿拉斯加州是距离东岸的新英格兰区最远之处。美国大西部的高山峻岭与沙漠把西岸与美国其它地区分隔开来，在越州铁路筑成以前，这些高山与沙漠几乎是不可能跨越的障碍。西岸诗人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 1930-）说：“铁路于1869年才筑到西岸，在那之前，由纽约坐船到旧金山的航程比下面的路线还要远，即由旧金山去香港、东京、菲律宾的路程，因为船需要绕南美洲航行”¹⁰。在航空客机普及以前，大西部的蛮荒成为美国人赴西部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即使是今天对西岸的美国人而言，朝东看，高山阻隔了他们的视线；但当他们面对太平洋时，他

⁸ Christopher L. Connery, “The Oceanic Feeling and the Regional Imagery”, p. 299.

⁹ Christopher L. Connery, “Pacific Rim Discourse”, p. 41.

¹⁰ 钟玲 2001 年 7 月 18 日史耐德专访。

们可以想象东亚在海的那边隐现。王红公说：“西岸与东方是接近的。它就紧邻在外头”¹¹。因此，西岸的地理与地形切断了它与美国东岸与欧洲的关连，并有助于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形成。

住在西岸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移民及归化美国籍的东亚人后代，其人口远比其他美国其它地区的多¹²。旧金山可以说是西岸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枢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始，旧金山就是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罗拔·哈斯（Robert Hass, 1941-）在他的散文诗《九月初》（“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¹³中以俏皮的方式介绍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在旧金山你可以对以下诸神祈祷：旧金山湾神、山神、守护城市的女神……中国、日本、俄罗斯、巴斯克、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的美食之神”（“here are some things to pray to in San Francisco: the bay, the mountain, the goddess of the city... the tutelary gods of Chinese, Japanese, Russian, Basque, French, Italian, and Mexican cooking”）¹⁴。哈斯谈的是城市的多元文化现象，王红公却是把亚洲文化视为旧金山生活本身的一部份，因为他认为此城市“与亚洲有活生生的接触。城市有其本身的亚洲生活。只要你想去，每个星期你都可以去看一场佛教徒办的篮球赛。全城到处都有佛教寺院”¹⁵。其实东亚的文化、社会、经济因素已深深渗透西岸美国人的生活之中，许多作家自己都有亚裔的同学、邻居，西岸人去唐人街吃中餐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因此西岸欧裔与英裔人的心中会发展出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是顺理成章的事。

自淘金热以后，西岸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产生了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平等主义（equalitarianism）两个特点。我认为这两种思想对太平洋意识的形成有催生的作用。斯蒂芬·施瓦茨 Stephen Schwartz 在他的书《从西到东：加州与美国心智的形成》（*From West to East: California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说，加州与美国其它各州不同之处在于“在文化认同方面，它属于激进主义”，以及它“从来没有经历过任

¹¹ Carole Tonkinson, *Big Sky Mind: Buddhism and the Beat Generati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5, p. 327.

¹²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在1950年全美亚裔人口为321,033，光是华盛顿、奥立岗、加州三州就有207,593人。

¹³ Robert Hass, *Praise*, Hopewell NJ: Ecco Press, 1979, p. 37-42.

¹⁴ Robert Hass, *Praise*, p. 40.

¹⁵ Carole Tonkinson, *Big Sky Mind*, p. 327.

何稳定状态时期，也没有经历过习以为常的保守主义时期”¹⁶。史耐德相信在淘金热期间，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界限不是松弛了，就是被打破了：

古老的贵族、世家，以前的精英分子，不再有其地位。在矿区，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与秘鲁人、获得自由的黑奴一起工作。人们接纳了平等主义思想。他们有一视同仁的精神。而且女性很活跃，传统区分男女生活方式的界线打破了。女人一样骑马，学会开枪，在农场工作，她们有些还去淘金。¹⁷

其实许多西岸作家都曾在政治上做过知名的活跃分子，或激进分子，包括罗宾逊·杰佛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王红公、穆里尔·鲁凯泽（Muriel Rukeyser, 1913-1980）、劳伦斯·佛令格第（Lawrence Ferlinghetti, 1919-）、丹妮丝·勒佛朵夫（Denise Levertov, 1923-1997）与艾伦·金士伯（Allen Ginsberg, 1926-1997）等。他们的激进主义与行动主义应该是源于他们反对美国主流生活的价值观，如基督教思想、中产阶级生活、欧洲文明中心的诸传统，或资本主义。因为这些作家认为自己属于边缘化的一群，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倾向接受其它被欧洲文明中心扩充主义者所边缘化的传统，如亚洲文化与印地安文化。此外，平等主义思想把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减低。有一段时间马克·吐温（Mark Twain）住在旧金山，他明显受到激进主义与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187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热心地为唐人街的中国人打抱不平，因为在一场排华的动乱中，美国白人抢劫中国人的商店，他发表以下维护中国人的言论：

他们属于一个性情温良、心存善意的民族，在太平洋岸每个地方，上流社会都尊重他们、善待他们。在加州，绝不会有一位绅士或女士在任何情况下侮辱他们，或欺负他们... ..只有本地人之中的小人才会做这种事，这些小人与他们的后辈；他们，

¹⁶ Stephen Schwartz, *From West to East: California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p. 4.

¹⁷ 钟玲 2001 年 7 月 18 日史耐德专访。

自然而然、次次必然，包括警察与政客，因为在这些小人后头，有为他们舔灰的、拉皮条的，有跟班的… …¹⁸

在马克·吐温之后约一百年，一些白种人排斥史耐德，认为他不应该那么喜欢中国东西，史耐德却完全不在意。史耐德 1960 年代写的一首讽刺诗《致中国同志们》（“To the Chinese Comrades”）¹⁹中，他笔带幽默地描绘，在伐木工人同伴的眼中，这个史耐德居然喜欢用酱油烧中国菜，简直已变成了一个古怪的中国佬（Chinaman）。

哥伦比亚地区雾笼的群峯与断崖，
老伐木工人在巨岩中消失。
他们不肯替我捐米与酱油
去越过大坝
“史耐德你简直越来越像
一个讨厌的中国佬。”

Misty peaks and cliffs of the Columbia,
Old loggers vanish in the rocks.
They wouldn't tote me rice and soy-sauce
cross the dam
“Snyder you getting just like
a damned Chinaman.”

我们都知道 “Chinaman” 这个字有种族歧视的含意。史耐德把这一段生活插曲写出来，应该显示他不在意其它白人把他当中国佬，我想他甚至颇为得意自己被认作中国人。因此，西岸的激进主义与平等主义应该协助作家克服了种放歧视心态，有助于他们形成

¹⁸ Stephen Schwartz, *From West to East*, p. 84.

¹⁹ Gary Snyder, *The Back Country*,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68, p.111-114.

太平洋意识。

詹姆斯·豪斯顿（James D. Houston）认为在1990年代，美国人认为西岸是“大洲的尽头”（“continent's end”），现在此一看法已经被包括加州在内的太平洋周边区域之意象所取代，在这个广阔的疆域，加州只是其中一点²⁰。但是我认为就太平洋意识而言，那种融和感尚未普及。在西岸长大的作家，以及一些由美国其它地区迁来西岸定居的作家，一定对当地的亚洲文化与亚裔族群感受颇深，然而只有少数作家才会把太平洋周边地区视为同一个区域，而且主动推行太平洋意识的作家就更少了。许多美国西岸作家的作品中，有亚洲文化的成分，但此论文只选以下几位讨论，因为只有他们曾深入研究过东亚文化，或曾英译过东亚文学作品，他们有些早于1950年代就已经对太平洋意识的课题有其洞见，这些作家包括王红公、劳伦斯·佛令格第、杰克·克洛厄（Jack Kerouac, 1922-1969）、盖瑞·史耐德、罗拔·哈斯与简·何丝费尔（Jane Hirshfield, 1953-）等六位作家²¹。此外，这些作家有些是西岸的本地人，有些是由外地迁来，但对西岸有深切的归属感²²。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多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精神上的关系。例如王红公被称为“旧金山文艺复兴之父”，是疲惫求解脱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年轻作家们的精神导师，年轻一代包括史耐德、克洛厄与佛令格第。此外，史耐德与克洛厄是好友，克洛厄在1956年4月至5月住在旧金山以北的密兜谷（Mill Valley）史耐德租的一幢木屋中²³。此外，哈斯和何丝费尔都推崇王红公的作品，以及王红公译的中国诗、日本诗，他们二人更视王红公与史耐德为他们的精神导师²⁴。这六位西岸作家也全都景仰大自然作家与环保家约翰·穆尔（John Muir, 1838-1914）与前辈诗人罗宾逊·杰佛斯。在

²⁰ Michael Kowalewski, “Jack Kerouac and the Beats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n Fiction: Essays in a Regional Literatu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5, p. 133.

²¹ 王红公与史耐德一生都勤于学习亚洲文化，并译过中国及日本诗歌。哈斯与何丝费尔译过日本古典诗。史耐德与何丝费尔致力于学习禅宗。克洛厄曾经一度热切地学习大乘佛教。佛令格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课题认真思考过。

²² 史耐德与哈斯都是西岸本地人。王红公、佛令格第和何丝费尔在他们二十、三十岁的时候，迁来西岸，定居于此。克洛厄在美洲各处浪迹，但因为他是疲惫求解脱一代（亦有译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主要人物，此世代许多活动都在旧金山举行，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常常住在西岸。

²³ 史耐德与克洛厄于1955年10至11月常见面，克洛厄住在史耐德家中一直到史于1956年5月15日赴日本。（Jacob Leed, “Gary Snyder, Han Shan, and Jack Kerouac”,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11.1, 1984, p. 191.）

²⁴ 何丝费尔说：“当然王红公的书是我的最佳模范”，又说：“我见到的第一位禅修者就是史耐德，那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他来朗读……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只看他一眼，我就理解一个西方人是可以做到的……只见那一次面，他就是我的导师。”（钟玲2001年7月19日专访何丝费尔。）哈斯说：“第一个教导我，在诗歌与我自己的世界之间可以有活生生的关联，就是王红公的一本书”。

（Robert Hass, *Twentieth Century Pleasure: Prose on Poetry*, New York: Ecco Press, p. 223.）

一次专访中，史耐德说美国文学“对西部西岸的描绘，或对太平洋坡岸的描绘，其实并不久远。可以说罗宾逊·杰佛斯起了个开头，对我们大家来说，他是我们的灵感，或在某程度上说，他也挑战我们”²⁵。由于在六位作家之间曾发生许多交流，而且他们彼此仰慕，可以说，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群落，而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则是他们六个人都拥有的。

史耐德与罗拔·哈斯二人的生活经验与作品本身，可以说是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写照。史耐德肯定视太平洋周边地区为同一个生态区域、同一个文化区。蒂莫西·格雷说史耐德“表现一种早熟的心智，收集、核对、翻译、传布各式各样的太平洋周边地区信息”²⁶。史耐德也是一位生态学家，他相信生活领域不是靠国界或州界来划分的，而是由生态区域来划分，如河流的流域，或海洋区域。一个生态区域不只是由住在其中的人们共享，也由居住其中的动物与植物共享²⁷。实例如下，在1980年代，史耐德带着他的小儿子玄·史耐德 Gen Snyder 到加州北海岸的特立尼塔海岬（Trinidad Head）去散步、骑单车、赏鸟，教导他何以眉饰海鹦，像他们两人一样，也是太平洋周边生态区域的居民。史耐德说：“对眉饰海鹦而言，这里实际上是它们活动范围的最南端。由阿拉斯加到白令海，下至日本北部，是它们筑巢最多的地方。冬季它们则远抵北太平洋辽阔的海上，就是在特立尼塔岬这个地点。我们自然而然会感受我们接触到整个太平洋与阿拉斯加的生命场域”²⁸。

史耐德还相信，住在太平洋周边地区所有不同的种族，都应该合作，甚至应该融合起来，尤其特别的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这个信念。他第三位与第四位妻子都是亚裔：雅·上原（Masa Uehara）是冲绳人，卡萝·国田（Carole Koda）是美国日裔人。卡萝与史耐德的养女 Kyung-jin 则是韩裔。当史耐德选择家庭成员时，是由太平洋周边其它地区来选，不论他的选择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结果是他家庭成员本身就实践了太平洋周边血缘的与文化的混合。1968年，史耐德与雅·上原带着他们的长子，婴儿

²⁵ Patrick D. Murphy, *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 Columbia S.C.: UP of South Carolina, 1992, p. 93-94.

²⁶ Timothy Gray, “Gary Snyder”, p. 23.

²⁷ Gary Snyder, *A Place in Space: Ethics, Aesthetics, and Watersheds*,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5, p. 223, 228-230.

²⁸ Gary Snyder, *A Place in Space*, p. 220-221.

开·史耐德（Kai Snyder）坐船由日本横越太平洋回加州，史耐德写下《海上首见龟岛》（“First Landfall on Turtle Island”）²⁹以称颂此行。蒂莫西·格雷称开·史耐德“是他（史耐德）所主张太平洋周边地区结合为一活生生的例子”（“a living reminder of his Pacific Rim communion”）³⁰，因为开是加州白种人与日本冲绳人的混血。因此《海上首见龟岛》一诗自然而然充满了喜悦，开自然成为诗中那位无畏的神话英雄、那位圣婴，因为他无惧于汹涌的大海，甚至有一条鲸鱼跟在船边，向此婴儿致敬。

罗拔·哈斯有一首较长的诗是自传式的，叫《皇冠或一位戴黑帽的舞者》（“Regalia or a Black Hat Dancer”）³¹，诗中描写他在东亚的一次经验，在此他自己严重的心理危机获得解决。哈斯在1980年代曾到韩国参加一次国际作家会议。他来韩国以前，因为他的婚姻结束了，遂陷入痛苦的深渊，并为一种虚空感所折磨。他说自己受到各种虚空感的袭击：“心巨大的空洞”（“the heart’s huge vacancy”）， “痛苦 / 它形成蜂巢满是空格”（“pain/ honeycombed with the emptiness of it”）， 还有，一种因“痛苦与欲望”（“pain and desire”）形成的空虚感。哈斯在欧洲文明中找不到任何抚慰，德国作家里尔克 Rilke、法国作家瓦勒里 Valéry 的作品都没有疗效。他探访距斧山四十哩外一座佛寺中的石窟佛陀像（Sokkuram Buddha），他感到那座佛陀的脸上与手上散发一种宁静：

几个月以后，在韩国
攀爬到佛陀像石窟——
可以俯瞰密林深谷，直望到日本海——
或许只是一瞥：他的眼睑闭着——你要
用手模仿它才能感受到石雕手势的细腻——
石雕的双手放在大腿上，全然安稳地张开。

²⁹ Gary Snyder, *Left Out in the Rain*,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6, p. 115.

³⁰ Timothy Gray, “Gary Snyder”, p. 34.

³¹ Robert Hass, *Sun under Wood*, Hopewell NJ: Ecco Press, 1996, p. 47-56.

Climbing in Korea,
months later, coming to the cave of the Sokkaram Buddha --
a view down a forested ravine to the Sea of Japan--
perhaps a glimpse: the closed eyelids -- you'd have to make a gesture with your hand to
get the fineness of the gesture in the stone --
the stone hands resting on the thighs, open utterly composed.

如果是在类似的状况下，一位在圣像前的天主教徒会静候显灵（revelation），哈斯也站在佛陀像前等候。结果是他在东亚的佛陀像里找到答案：不会有显灵，也不会有征兆而是要从自己内心寻求领悟：

那阴凉的黑暗中，雕了很多菩萨像，
我再次祈求某种显灵。
什么都没有。无比宁静，流动的石头。既无悲伤，亦无无悲伤。
莲花，雕在山脚墙上，简单、丰腴、开放。

in the cool darkness carved with bodhisattvas,
I presented myself once more for some revelation.
Nothing. Great calm, flowing stone. No sorrow, no-not sorrow.
Lotuses, carved in the pediment, simple, fleshy, open.

他由佛像表现的“无比宁静”（“great calm”）领悟到“既无悲伤，亦无无悲伤”（“no sorrow, no-not sorrow”）；第二个英文词实是呼应佛经中的境界，即《心经》中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或《金刚经》中所说的“非法，非非法”。他领悟到，要减轻痛苦，自己需要达到更高层次的内心境界。他在诗中描绘莲花的意象，用了“丰腴的”（“fleshy”）一字，以暗示答案是在一个人的尘世生活之中。这层领悟令他有能力

给自己开药方，以重获心理平衡。他的方法类似禅宗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内求于己。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禅宗在西方流行，铃木大拙（D.T. Suzuki）的英文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说：“禅宗信仰的最终极权威是在一个人的内心，而非外在”；他又说“那么，在禅法之中，人无所遁逃，也没有神秘之处… … 总是以无穷的不同的方式在禅修方面来进行”³²。身处韩国的哈斯似乎在实践这种禅修。另一位禅宗的传布者艾伦·瓦兹（Alan Watts）说：“有时可用‘率直’或‘付诸行动’来形容禅，因为禅是顺应生活，而不试图阻止或打断其进行”³³。我们可以由哈斯下面一段诗印证，他其实是实践这种“付诸行动”（“going right ahead”），即顺应地生活：

… … 发明一种仪式。

下午漫步上山，收集小松枝。

点一堆火，抽根烟，不是起一堆大火，

坐在火前，观望它烧成灰烬，

最后一点闪光由火堆消失，黑暗降临。

然后你站起来，拍拍身子，步行回到这个世界。

如果幸运的话，你会感到饿。

… …

我是吃一只子鸡吗？

两片蛋饼。一陶杯的啤酒。在大伞底下

坐下，在一堆食客中，看他们

大吃，为分裂的国土争吵，

是该把骨头也吞下？正是如此，我就吞了。

… … Invent a ritual.

³² D.T. Suzuki, *Studies in Zen*,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55, p. 22, 204.

³³ Alan W. Watts, *The Spirit of Zen: A Way of Life, Work, and Art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8, p. 52.

Walk up a mountain in the afternoon, gather up pine twigs.
Light a fire, then smoke, not an ambitious fire,
and sit before it and watch it until it burns to ash
and the last gleam is gone from it, and dark falls.
Then you get up, brush yourself off, and walk back to the world.
If you're lucky, you're hungry.

.....

Was I going to eat a baby chick?
Two pancakes. A clay mug of the beer. Sat down
under an umbrella and looked to see, among diners
feasting, quarrelling about their riven country,
if you were supposed to eat the bones. You were. I did.

以上哈斯这段诗中的心路历程，可以说类似一位禅修者的经验，他集中注意力，专心考察自己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并根据自己开出的心灵药方行动。因此，这位由太平洋东岸来的欧裔美国诗人，把自己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落实在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宗教中；所以说哈斯这首诗内含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深层意义。

在杰克·克洛厄写的几部小说之中，《得道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充分表现了这种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这种意识具体呈现在小说两位主角的塑造上，即杰非·赖德（Japhy Ryder）与小说的叙述者。杰非·赖德是史耐德的化身，这位主角精通佛教，而且打算去日本学禅。而叙述者雷·史密斯（Ray Smith）则应该就是写克洛厄自己，在小说中连他也成为禅宗的信徒了。在这位叙述者的眼中，杰非，一位美国西岸的本地人，在他去太平洋另一边的日本之前，已经变成一个亚洲人了：杰非是“一个个子小小，面有皱纹，棕色皮肤，难以想象的中国流浪汉”（“a little seamed brown unimaginable China hobo”），也是“东方群山中寒山的精魂”（“the Han Shan ghost

of the Orient mountains”)³⁴。我们可以由这两位主角的塑造上看到，史耐德与克洛厄对亚洲文化深深仰慕，他们虽身在美国西岸，但在精神上却认同亚洲的智者，克洛厄把史耐德铸成一个东亚人与美国人的混合自我。到了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史密斯一个人住在孤寂峯（Desolation Peak）上，他最后见到一个双重主角的幻象，即半中国人、半美国人的幻象，而且他获得了醒悟：

忽然我似乎看见那个难以想象的小个子中国流浪汉站在那里，在雾中，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那种没有表情的幽默… …他是比生活更真实，我梦中的杰非… …就是杰非指引我来这里… …似乎他站在孤寂峯上，站在扭曲的岩石老树旁，证明这里的一切，证实这里的一切… …

And suddenly it seemed I saw that unimaginable little Chinese bum standing there, in the fog, with that expressionless humour on his seamed face... it was the realer-than-life Japhy of my dreams... .. It was Japhy who had advised me to come here... he seemed to be standing on Desolation Peak by the gnarled old rocky trees certifying and justifying all that was here.³⁵

这个孤寂峯上出现的精神导师幻象是两个人的混合，一个是唐朝诗人寒山，即“那个难以想象的小个子中国流浪汉”，另一个人是盖瑞·史耐德，那个“比生活更真实… …的杰非”；这个双重主角成为一个文化混合的文学象征，也变成疲惫求解脱一代的偶像。因此，《得道流浪汉》小说实充满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不只因为在双重主角的形象中，有太平洋周边地区种族（中国人与美国人）上的混合，而且因为出现美国山水与中国山水的重迭，即美国西岸的山脉与中国东南岸天台山的寒岩。

劳伦斯·佛令格第则抱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思考与陈述太平洋两岸的种族关系、国家关系、地区与社会关系。佛令格第的一首诗《仿鸟的叫声》（“After the Cries of

³⁴ Jack Kerouac, *The Dharma Bum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9, p. 163-164.

³⁵ Jack Kerouac, *The Dharma Bums*, p. 191.

Birds”)³⁶写于 1950 年代，此诗讽刺美国西岸人对太平洋的典型的狭隘心态，换句话说此诗突显了周边地区意识这个主题。此诗的叙述者说他住在西岸，住在大陆的边缘上，他要抓紧西方文化不放，而且他不愿意接受东方：

而且是最后的边疆
已无处可去了，只能留在其中
不能面对它
只能把它的头埋起来
西方文明已经向西走得太远
可能要承受大海变出的戏法
变成某种东方式的东西
那怎么可以呢

and the Last Frontier
having no place to go but In
can't face it
and buries its head
Western civilization gone too far West
might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else Eastern
and that won't do

佛令格第用此诗来讥讽美国一般民众的态度，即那位叙述人所代表的那种狭隘心态；此诗讽刺的语气与叙述者可笑的鸵鸟政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此诗叙述者的心中更有黄祸（Yellow Peril）思想，认为东方人充满敌意，并富侵略性。在《仿鸟的叫声》一

³⁶ Lawrence Ferlinghetti, *The Secret Meaning of Thing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8, p. 32-39.

诗中，叙述者竟然妄想中国的帆船舰队来登陆加州了，诗人说东亚文明入侵美国了，其实说的是反话：

中国的帆船队忽然
在大苏海岸外出现了
船上不只是有中国哲学家
他们在梦蝴蝶
我们要如何迎接他们？我们
准备好接纳他们吗？

Chinese junks show up suddenly
off the coast of Big Sur
filled with more than Chinese philosophers
dreaming they are butterflies
How shall we greet them? Are we ready
to receive them?

在此“中国哲学家”是指庄子（公元前 369-286）以及他之后的道家思想家；他们的想法不只有深见，而且富诗意。佛令格第应该是忠告美国人要接受这种比西方更超越的精神文明。他对美国的少数民族也持包容的态度。他的散文诗，《伟大的中国人》（“The Great Chinese”）³⁷写于 1960 年代，诗中的叙述者讽刺英裔、欧裔白人的狭隘态度及种族偏见，这些白人在中国农历年涌到旧金山唐人街来看春节的舞龙：

那些穿蓝色衣服的人，像父亲般慈爱地观看着，他们代表我们更进步的文明，因为已到达非常高的民主境界，所以甚至可以允许一些野蛮人在我们中间举办他们

³⁷ Lawrence Ferlinghetti, *Starting from San Francisco*,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1, p. 37-40.

古怪的习俗。

... .. paternally watched-over by those benevolent men in blue who represent our more advanced civilization which has reached such a high state of democracy as to allow even a few barbarians to carry on their quaint native customs in our midst.

然后，此诗讽刺欧裔、英裔美国人的黄祸思想，因为他们把游行队伍中所舞的龙，当成是中国势力兴起的象征，也象征一种威胁美国的力量。

蓝衣的市民谈来谈去都认为他想要逃跑；不论如何，都不可以让他逃走，因为中国巨龙是全世界最具有潜力的龙，如果让他由唐人街逃出来，可能晚上会奔驰到他们新的高速公路那儿，在百老汇街入口处，误把那儿当做是中国的长城或当做是其它蛮族起的屏障，所以就会沿着它斜行，把柱子和路标都嚼烂吞下，且打嗝吐出一种奇怪的溶解液，可以把美国的混凝土大墙溶化掉，他们怕这条中国巨龙会由旧金山出发走得很远，所以他们已经秘密地、稳固地把他的尾巴尖绑起来了… …。

The blue citizens on their talking cycles think that he wants to escape and at all costs h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escape because the great Chinese dragon i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dragon in all the world and if allowed to escape from Chinatown might gallop away up their new freeway at the Broadway entrance mistaking it for a Great Wall of China or some other barbarian barrier and so go careening along it chewing up stanchions and signposts and belching forth some strange disintegrating medium which might melt down the great concrete walls of American and they are afraid of how far the great Chinese dragon might really go starting from San Francisco and so they have secretly and securely tied down the very end of his tail... ..

这段中的“美国的混凝土大墙”（“the great concrete walls of American”）可以象征白种人的防御心态以及象征他们的一种恐惧，即他们恐惧失去陈国贲所谓的“英裔的传统”（“Anglo-conformity”）或“美国化的特质”（“Americanization”）³⁸，因为北美洲少数族裔诸文化正急速兴起。因此早在 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佛令格第已经嘲讽白人后殖民的种族歧视心理，他可以说是突显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方面的先行者。在《仿鸟的叫声》中，他还提出在城市认同方面，旧金山的身份很暧昧。旧金山是一个西方的城市，还是亚洲的边疆？他认为旧金山市是：

从来不曾真的是美国的一部份
东方、东方，以及西方、西方
这对双胞胎很久以前就相遇了
相遇在“追求心智背后种种东西
的期望”之中

never really a part of America
East East and West West
and the twin met long ago
in
“the wish to pursue what lies beyond
the minds”

佛令格第似乎在暗示太平洋区东方的与西方在文化上的融合早已经在进行了，在旧金山的市民心中也已经在进行了。

当我在 2001 年夏天访问佛令格第的时候，问他对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看法，他

³⁸ Kwok Bun Chan, “From Multiculturalism to Hybridity: The Chinese in Canada”, *Governan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2004, p. 228.

用讥讽的方式回答我，甚至讽刺他自己。到2001年他在旧金山写作与生活已经半个世纪了，而且在旧金山创办了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 Bookstore）与出版社，名扬国际；然而他却说自己是个纽约人，只是来旧金山长期作客³⁹。他书店与出版社的位置紧邻唐人街，然而他却认为唐人街的生活与他的生活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文化”（“mutually exclusive cultures”）；他还说他对亚洲文化没有什么兴趣，他认同的是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因为他是意大利后裔，他说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意大利。但是我认为在他创作中他却表现不一样的立场，在《伟大的中国人》一诗中，他对那条中国舞龙表现了关爱；他书店与出版社的合伙人则是一位日裔美国人 Shigeyoshi Marao，可见他对东亚文化与东亚人的关心。佛令格第常常发现生活中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但在其内心，他是位自由主义者，力主多元文化与平等主义。

事实上，美国西岸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常引用东亚的文学意象、作品的文本、与观念。然而这种普遍的现象并不代表这些作者都有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有时候，他们如此引用只是一种表面的装饰，有时候引用这些意象、引文与观念，只是为了强化作者所采用之欧洲文明的思想。例如说麦可·麦克洛（Michael McClure, 1932-）曾说他的诗歌采用过《道德经》的观念与华严宗的思想。他不少作品主要提倡一种“活生生的生物体”

（“living organism”）思想，此思想实质上是源自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念。麦克洛说：“如果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与活生生的话，如果一切都是道家所谓的‘朴’，那么其全部或每一部份都是美好的（或也可能都是丑恶的），而且都有无比的价值。你不能说一个病毒没有一只狼、一双蝴蝶、一朵玫瑰特别，或没有他们神圣。”（“if all is divine and alive – and if everything is the Uncarved Block of the Taoists – then all of it and any part is beautiful [or possibly hideous] of enormous value. It is beyond proportion. One cannot say that a virus is less special or less divine than a wolf or butterfly or rose blossom.”）“麦克洛相信，在宇宙中任何一种事物，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体”，“这种生物体是环境的漩涡，用道家的话来说，是时空的朴（在这个宇宙中，时空没有被度量好的事件，分割为交叉的平面）”（“the

³⁹ 钟玲 2001 年 7 月 26 日专访佛令格第。

organism is swirl of environment in what the Taoists call the Uncarved Block of time and space [a universe in which time and space are not separated into intersecting facets by measured incidents])⁴⁰。在此，他用《道德经》中“朴”的观念来说明一种野性的、动态的、活生生的生物体，但是在《道德经》中，“朴”其实是指一种智性的、包容的、静态的、原始状态的存在⁴¹。因此，麦克洛应用一种道家的观念来强化他自己的思想系统，换句话说说他扭曲的道家的观念来强化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到底住在太平洋岸的亚洲人有没有一种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意识呢？答案大概是“没有”。东亚人对太平洋对岸的邻居大底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的心中仍横梗着过去殖民地时代受压迫的、受压榨的经验⁴²。在二十世纪中叶又有广岛、长崎的创伤与朝鲜战争的创痛，二十世纪末叶至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这些都令东亚人对隔海的美国心存戒惧。此外，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对东亚移民一直都持歧视态度，而且在法律上与社会上，东亚人也受到不公平之待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霸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大致结束，但亚洲的国家仍然处在由西方掌权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之中，这种新殖民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由“外资与本地特权阶层……的结合，原来直接的政治与军事统治已经转换为一种抽象的、半间接的，大致上是经济形式的控制”⁴³。另一方面来说，虽然东亚人民对对岸邻居在心理上有隔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们已经采用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自1960年代开始，在香港、台湾、南亚的中国人、华人，“为了逃避政治压迫、或为了逃离可能发生的动乱，以免生意受损，家人受害，他们取得了西方国家的居住权”⁴⁴。

⁴⁰ Michael McClure, *Scratching the Beat Surface: Essays on New Vision from Blake to Kerouac*, New York: Penguin, 1994, p. 27-44.

⁴¹ 见《道德经》第28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是、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第32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⁴²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半叶，西方霸权之一的美国曾把亚洲一些地区占为殖民地，或试图攻占亚洲一些地区，如美国为了由西班牙手中接收菲律宾为殖民地，曾在1898至1902年与菲律宾人民打仗。

⁴³ Shohat Ella and Robert Stam, “From the Imperial Family to the Transnational Imagery: Media Spectatorship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6-147.

⁴⁴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9-120.

只要中国、台湾、香港及其它亚洲地区发生政治方面的动荡，在太平洋边缘的温哥华与加州就成为这些中国人、华人的避风港。有些投资地产及投资其它商业的新移民，在太平洋彼岸形成新的种族聚落⁴⁵。在动荡结束以后，有一些中国人及华人移民会回归亚洲原居住地。有几位台湾、香港与内地的作家，就是这几波离散迁移的一份子，由东亚迁至美国、加拿大，以逃离政治动荡⁴⁶。然而这些作家大多在笔下写他们亚洲的故国，或写他们在北美中国人圈子的故事。

几乎没有什么东亚作家提倡太平洋周边地区的融合。然而由于盖瑞·史耐德积极倡此周边地区意识，受了他的影响，一些他的东亚朋友也赞同这种意识。史耐德的日本友人木七尾（Nanao Sakaki, 1923-）是一位诗人与思想家，也相信周边地区是同一个生态地区。木七尾与史耐德一样，作为诗人与生态学家，他们都致力投入保护大自然的运动。史耐德认为木七尾是“全日本山脉与河流非官方的调查专员”，当木七尾于1969年访问美国时，他觉得在美国西岸完全像在自己家一样⁴⁷。此外史耐德于2000年3月组织了一个在檀香山举行的座谈会，木七尾、艾伯特·西条（Albert Saijo, 1925-），一位在夏威夷居住已十五年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与史耐德一同表演诗歌朗诵⁴⁸。这次活动亦称为“三位太平洋的漫游者”（“Three Pacific Wanderers”），等于是具体化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因为活动本身在檀香山举行，檀香山是太平洋圈的中心，而且在种族上，三位诗人明显呈现了周边地区的混合：一位欧、英裔美国人、一位日本人、一位日裔

⁴⁵ 在1985年以前，成千上万台湾来的、说普通话的移民，由香港、印度尼西亚来的说粤语的华人移民，落脚在加州的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形成了北美洲第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城郊住宅区。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0, p. 207.）香港商业精英与加拿大商业精英结合起来，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起催生了这种“主格‘中国的’与主格‘加拿大的’公民”（Katharyne Mitchell, “The Hong Kong Immigrant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Shaping the Transnational Cosmopolitan in the Era of Pacific Rim Capital”, *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86.）。许多富有的商家持续“在太平洋两岸来回飞，而他们的太太和孩子则住在北美洲”（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p. 127.）。在1970与1980年代，加州变成某种有如“多元文化的、新世界的半个国家，由于它固定收受日本、台湾与南韩的资金”（Christopher L. Connery, “Pacific Rim Discourse”, p. 43.）。

⁴⁶ 他们包括来自台湾的诗人郑愁予；来自台湾的小说家于梨华；来自香港的诗人黄国彬，他在1990年代回香港；来自香港的诗人戴天；来自香港的小说家梁锡华；来自内地小说家阿城等。

⁴⁷ Gary Snyder, *A Place in Space*, p. 122-124.

⁴⁸ 这个活动是由位于Manoa的夏威夷大学举办的。在这个朗诵会中，歌手乌士达·波布 Uchida Bobbu 唱了几首冲绳岛的民谣，日裔夏威夷诗人理查德·哈马沙纪 Richard Hamasaki 协助组织这次活动，并为之现场录音，制成CD：“剪刀、石头、布 / 夏威夷 / 诗歌 / 盖瑞·史耐德，艾伯特·西条，木七尾”

“*Fan Ken Po / Live in Honolulu / Poetry / Gary Snyder, Albert Saijo, Nanao Sakaki*” (Honolulu: Elepaio Press, Hawai'i Dub Machine and Limakokua Productions, 2003.)

美国人。

以下几位美国西岸作家可以说是在积极融合东方与西方文化方面的典范，他们包括王红公、杰克·克洛厄、菲力普·韦伦（Philip Whalen, 1923- 2002）、卢·韦曲（Lew Welch, 1926-1971）、盖瑞·史耐德、罗拔·哈斯和简·何丝费尔等。在全球的、跨国的文化舞台上，这些作家可说是稀有而独特。当亚洲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都“泛滥着美国电影、美国电视剧、美国流行音乐与新闻节目时，对第三世界的众多文化产品，第一世界接受的却少得可怜”⁴⁹。然而这些美国西岸作家却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与写作中，吸收亚洲文化的因素，以寻找一种新的经验范畴，一种新的理想境界。他们视亚洲文化与自己的欧洲中心文化为平等的，并且积极地向亚洲文化学习，及吸收养分。这些作家为结合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而努力，他们也为一种开放的、延伸的文化本土化而努力。他们的立场与一直以来主流的、后殖民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完全不同。他们没有采用殖民者优越的、自负的心态来对待东方，反而能正视地理上、历史上与心理上的真实状况并能由亚洲诸文明里寻求精神上的力量与采用其智慧的结晶。德里克（Arif Dirlik）写说，在1980年代，兴起了一种“批判性的本土主义（critical localism）……它以本土为实现希望的地点，而且由于全球所发生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活化了对本土一种激进的再思考”⁵⁰。一方面来说，东亚各不同种族与不同的文化之间早已经进行融合很久了，而在美国西岸，这些作家为美国西岸的本土文化而努力，他们的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可以说是“批判性本土主义”的一种呈现。

换句话说，当这些作家在自己作品中采用东亚文化因素的时候，身在欧洲文明传统中的他们，可以说的创造出一种新颖的、革新的混合体。有时候东亚的意象和思想融入他们作品的文本中，犹如这些意象与思想原本就是他们承继的、已经融合的全球文化传统。简·何丝费尔的诗《心的算数只知道一》（“My Heart’s Counting Knows Only One”）⁵¹就是一例：

⁴⁹ Shohat Ella and Robert Stam, “From the Imperial Family to the Transnational Imagery”, p. 148.

⁵⁰ Arif Dirlik,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

⁵¹ Jane Hirshfield, *The Lives of the Hear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p. 7.

在宋朝中国

两个和尚，六十年的朋友了，

正望着大雁飞过。

「牠们飞往何处？」

一个考另一个，他答不出来。

.....

有时候我想起他们，

站着，因哀伤而迷惑，

他们秋天的夹袍里缝了雁绒。

.....

那些尚未被吞没的雁

仍听得见牠们微弱的鸣声；

我的爱，即使是我们，也不会全然迷失。

In Sung China,

two monks friends for sixty years

watched the geese pass.

Where are they going?

One tested the other, who couldn't say.

... ..

I think of them sometimes,

Standing, perplexed by sadness,

Goose-down sewn into their quilted autumn robes.

... ..

As the barely audible
geese are not yet swallowed;
as even we, my love, will not entirely be lost.

在何丝费尔这首英文诗中，那个中国禅宗公案故事已经融入她的深层经验之中，也融入这首诗的创作之中。这些西岸美国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作品中引用过以下中国古典诗人的英译文本：陶潜、王维、李白、杜甫、寒山、白居易、以及禅宗公案，犹如这些中文作品是他们自己文学传统的一部份⁵²。换句话说，这些作家显示他们能够引用中国作品如同他们引用莎士比亚、华兹华士（Wordsworth）一样自然。王红公的长诗《心之园、园之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引用的中国诗与日本诗超过二十首，这些引文在文本中融入无间⁵³。当这些美国作家在自己作品文本中采用东亚文化因素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欧美文学传统中创造一种新的混合体，也可以说是某一种“批判性的本土主义”。

在 1980 年代，加州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在太平洋周边地区内提升加州的领导地位，因此加州有四间大学成立了太平洋周边区域的研究计划与研究中心⁵⁴，太平洋周边地区研究也成为以下领域中学者们喜爱的一个主题：全球化 / 本土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人类学与经济研究。加州大学系统在 1986 年成立了太平洋周边研究计划（Pacific Rim Research Program），自那时起就资助了很多研究案。然而，学者们大多侧重研究在此地区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各种情况与变异；很少有人触及是否有文化人或作家相信此周边地区之意识，或提倡此意识与实践此意识。有趣的是在 1990 年代开始发生变化了。《亚洲 / 太平洋之为文化产品的空间》（*Asia/ 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一书出版于 1995 年，在学术研究论文之中也印了一些诗

⁵² 例如说，王红公的《轮转》（“The Wheel Revolved”）（Kenneth Rexroth, *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p.20）提到白居易；史耐德的《仿陶潜》（“After Tao Ch’ien”）（Gary Snyder, *Left Out in the Rain*, p. 195）模仿陶潜一首诗的风格和思维方式；简·何丝费尔的《破晓前读中国诗》（“Reading Chinese Poetry before Dawn”）（Jane Hirshfield, *The Lives of the Heart*, p.83）提到杜甫。

⁵³ 见钟玲的论文《王红公英诗里的中国风味》，《中西比较文学论集》，郑树森等编，台北，时报文化，1950，第 124 页。

⁵⁴ 这四间大学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园、旧金山大学与多明尼肯学院。

歌与故事，皆以太平洋周边意识为主题，其中有一首诗作者为罗桑·富沙欧·伊那达（Lawson Fusao Inada），其诗《把太平洋缩小》（“Shrinking the Pacific”）⁵⁵如下：

就像是，对我而言小事一件，只要
现在开车到西岸去，俯瞰
这个太平洋海湾，跃过一个轮渡，一架飞机
或甚至跃过闪耀的大桥，
然后跃进北海道里，绕一绕北海道，去吃午餐。

可以在那儿过夜，也可以回到奥立冈州
现在此州已到处是北海道的游客。
其实只是邻居而矣——很难分出谁是谁。

Like, it's no big deal for me to simply
drive over the coast now, overlooking
the Pacific Inlet, hop a ferry, a plane,
or maybe even take the gleaming bridge,
and bop into and around Hokkaido for lunch.

Maybe stay the night, or come back to Oregon,
which, by now, is full of Hokkaido tourists.
Neighbors, actually – it's hard to tell which.

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了，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在大众艺术与大众文学方面进行甚速。西方的生活方式与西方思想盛行于亚洲久矣，与此同时，亚洲的文

⁵⁵ Lawson Fusao Inada, “Shrinking the Pacific”, *Asia/ 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0-81.

化因素也已开始越过太平洋，渗入西方。那些提倡太平洋周边地区意识的美国西岸作家与思想家曾积极地选择与结合异国的、边缘化的东亚文化因素，融之入他们自己的传统之中，他们一方面促成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再生与提升，另一方面能把不同的文明作深层的融合。他们是未来全球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先驱。